

书品

SHUPIN

二零零六年·第一辑

- ◎傅璇琮 《东京梦华录笺注》序
- ◎陈尚君 《全唐文补编》出版感言
- ◎辛德勇 《三辅黄图校释》后述
- ◎徐兴无 《陈仲甫先生论韵遗墨》及其他

书品

中华书局

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1

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

时 间：1958年9月13日下午

出席人：范文澜、吴晗、尹达、侯外庐、金灿然、张思俊

（一）听取报告标点前四史工作概况，商讨办法如下：

1. 史记已有朝辞刚用金陵本为底本的标点底稿，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负责复校。前汉书用王先谦补注本，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、二所负责组织人力标点。后汉书用王先谦集解本，金兆梓现正进行此书的标点工作。由中华书局负责督促完成。三国志的标点由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。
2. 四史的标点分段体例应予以统一，以资治通鉴的标点体例为标准，由中华书局负责草拟印发。各书后附载历史地图，书后装帧应力求简便。
3. 历代避讳字可制成对照表，作为附录。本文中一般不改。
4. 前四史的标点、出版工作应在一年内完成，争取明年国庆节前陆续出齐。其中史记一书争取今年年底出版。
5. 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，亦即着手组织人力，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。

（二）关于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的决议：

1. 此项工作已商请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。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负责审阅。
2. 改绘工作原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负责，地图出版社派人协助。拟请科委与教育部联系将此工作列入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，由该校负责领导完成。

中华书局最近新书

《殷虚书契考释三种》(全三册) / 罗振玉 撰 / 380 元

《武威汉简》(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) / 甘肃省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/ 580 元

《操缦琐记》(函装十册) / 张子谦 著 / 1200 元

唐宋史料笔记丛刊

《封氏闻见记校注》/ (唐) 封演 撰 赵贞信 校注 / 11 元

《容斋随笔》(全三册) / (宋) 洪迈 撰 孔凡礼 点校 / 78 元

清代史料笔记丛刊

养吉斋丛录 / (清) 吴振棫 撰 童正伦 点校 / 32 元

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(全三册) / (明) 冯梦龙 编纂 刘瑞明 注解 / 48 元

世界汉学论丛

中亚简史(外一种) / (俄) 维·维·巴尔托里德 (法) 伯希和 等著 耿世民 译 / 18 元

敦煌·民族·语言 / (日) 高田时雄 著 鍾狷 等译 / 36 元

日本中国学文萃

纵谈十二生肖 / (日) 南方熊楠 著 栾殿武 译 / 42 元

中华文史新刊

赵翼史学新探 / 白兴华 著 / 18 元

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/ 陈元锋 著 / 26 元

现代史学家文丛

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/ 孙毓棠 著 / 36 元

中国钱币丛书

世界各国铸币史 / 刘森 译 万永彬 校译 / 168 元

中国铜元分类研究(全三册) / 段洪刚 著 / 520 元

金泉沙龙——历代名家货币思想述论 / 欣士敏 编著 / 38 元

汉语的祖先 / (美) 王士元 主编 李葆嘉 主译 / 48 元

读书与藏书之间 / 辛德勇 著 / 28 元

觉世与传世——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/ 夏晓虹 著 / 32 元

傅璇琮 《东京梦华录笺注》序	3
----------------	---

编撰谈

陈尚君 《全唐文补编》出版感言	9
-----------------	---

谢俊美 《翁同龢集》编辑出版感言	1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崔文印 写在《王毓铨史论集》出版之际	20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评书论学

辛德勇 《三辅黄图校释》后述	2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欧明俊 评《饮水词笺校》(修订本)	4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卞东波 新材料与新发现	
——读《海外新发现〈永乐大典〉十七卷》	45

黄仕忠 评《〈琵琶记〉版本流变研究》	
——兼答金英淑女士	51

张继海 推介《容斋随笔》新整理本	6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曾昭聪 佛经音义研究的最新成果	
——读《玄应〈众经音义〉研究》	63

读书札记

- 徐兴无 《陈仲甫先生论韵遗墨》及其他
——有关《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》的史料 67
- 顾 农 中古时代的四篇《寡妇赋》 75

商榷篇

- 王 和 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献疑点滴 80
- 谢秉洪 点校本《汉书》误排举隅 82

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I

- 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 89

书苑摘英

- [唐]封演撰、赵贞信校注《封氏闻见记校注》，李裕民著《四库提要订误(增订本)》，郭在贻著《训诂学(修订本)》，史存直著《文言语法》，中国钱币学会等编著《永隆通宝钱范》 91 - 94

古籍小常识

- 甄士龙 禁不断的李贽之书 95

主办单位：中华书局 主编：徐 俊 副主编：沈致金

编辑：《书品》编辑部 责任编辑：林玉萍

邮编：100073 地址：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

电话：(010)63458226 传真：(010)63458226

印刷：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订购处：全国各地邮局

国外代号：1369BM 国外发行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(北京 399 信箱)

国内代号：18—206 国内发行：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

网址：www.zhbc.com.cn 电子信箱：shupin@zhbc.com.cn

《东京梦华录笺注》序

傅璇琮

这部近一千页，约六十馀万字的《东京梦华录笺注》，经伊永文先生历时二十多年的专心研究，艰苦努力，现在终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，我内心深有欣慰之感。我与伊永文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已相识，那时他从天津南开大学来北京，转致前辈学者王达津教授一信，信中介绍了永文先生对《东京梦华录》的笺注工作。我时正任中华书局总编辑，就抽时间阅看永文先生带来的部分样稿，对他的研究思路与笺注方向甚为赞赏，后经交谈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，表示中华书局可以接受这一专题。从此以后，他的这一《东京梦华录》笺注工作就全面展开。

我对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是深有感情的。1955年我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留校任浦江清先生助教，重点在宋代文学教学，那时我就读了《东京梦华录》。此书著者孟元老于北宋晚期即徽宗崇宁二年癸未（1103）即居住于汴京，至靖康二年（1127）因金人入侵，才避乱南下。他在汴京住有二十四年，很有感于当时“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”。他后于高宗绍兴十七年丁卯（1147）作此书序时，就特描述汴京城内，“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；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；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”；正因此，那时不论“垂髻之童”、“斑白之老”，皆“时节相次，各有观赏”。这确如南宋时洪迈《容斋诗话》所说：“国家承平之时，四方之人，以趋京邑为喜。”也正因此，孟元老在南方居住时，缅想当年风情，“节物风流，人情和美，但成怅恨”，于时立志就省记所及，“编次成集”，“庶几开卷得睹

当时之盛”。孟元老一方面富有情致地缅怀北宋都城的美丽景观，另一方面则以极为精细的笔调描画市民日常生活，应当说这是有关我国城市社会文学作品的开创之作，极有历史文化价值。

也正因此，1980年间，那时我刚由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任调任副总编，就建议与商务印书馆协商，将商务于1959年出版的邓之诚先生的《东京梦华录注》列入中华书局的“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”，重新出版（后于1982年1月印出）。但此后听说友邻国家日本有译注本出版（即永文先生本书序中提及的日本京都大学入矢义高、梅原郁《东京梦华录译注》），对邓注本多有批评。那时我对京都译注本原书虽未看到，但甚有所感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名著，作为本国的文化遗产，中国的学者有责任、有义务对此作出更大的努力。80年代以来，我们中国学者关于《东京梦华录》的释义，也有一些文章刊发，但还处于零散状态。正因如此，90年代初，我一晤及伊永文先生，即以学术同行与出版者身份，表示极为赞同他的工作意向。

永文先生一开始作此专题，就已有创新意识。上世纪70年代中，他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，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名专家王达津先生接触甚密，在王先生指导下，开始对《水浒传》进行研究。后又受到南开几位学者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、小说戏曲史专家宁宗一、朱一玄先生等指导，写有《〈水浒传〉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》一文，刊于1975年《天津师院学报》第四期，颇受学界的关注、重视，古代小说研究界就有一种“《水浒》市民说”。由此，他就由《水浒》研究而进入对市民、城市的探索，这就必然触及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于是有关《东京梦华录》及市民生活的资料就逐渐有所积累。80年代起，一方面他获睹中华书局出版的邓之诚注本，一方面在作《宋代城市风情》一书，就将二者结合起来。那时他又较为全面地查阅了宋代笔记小说，一边写书，一边就作《东京梦华录》注，于1987年完成十五万字的初稿。据说他曾以这一初稿与一家出版社商议，但却未被接受。他当时已调至黑龙江商学院工作，就

又从事于资助项目《明清饮食史》之研究。不过这一饮食史项目，仍有益于对《东京梦华录》作注，特别是因此而熟悉和掌握了许多烹饪资料。邓之诚注本自序中曾特提出：“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。”永文先生因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，由此对邓注作了不少补正，并曾写有好几篇有关宋代饮食、科技等专文，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，据我所知，有《宋代船坞略考》（即《东京梦华录》“奥屋”之释文）、《中国最早的暖水瓶》（即《东京梦华录》“提瓶卖茶”之释文）、《唐宋文身及其文化意蕴》（亦即《东京梦华录》有关“文身”的释文）等。这都为《东京梦华录笺注》作了充分的准备，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。

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永文先生后虽又调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，但在这长时期从事笺注工作，从未得到过科研经费资助。这样，他有时出外查阅资料，参加学术会议，长途跋涉，都是自己出钱的。但他不为所动，不受阻挠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有云“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”。我想，就我们学者来说，此所谓“有德”，当应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奉献的气质。

就上所述，我觉得，从这部《笺注》成书过程与书的本身来说，此书确有两大特色，即一为专，二为通。所谓专，即前所说的，超脱名利，一心为学；专心一致，力求创新。当然这也体现在书的本身，而就书本身而言，则主要是博通，即不拘限于传统的校注体例，而以较开阔的学术视野，多角度多层面地运用各种样式的文史资料，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，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术探索。

本书以邓之诚注本与日本京都大学译注本作为主要参考，虽然按照著者所定的体例，凡二者已注的，此书就不注，但仍细心关照此二书的成果，同时又充分注意我们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，作对成果充分吸纳，对疑误又细心纠察。如卷一“大内”条“泛索”一词，邓注本引《宋会要》、《事物纪原》所载“取索司”以证“泛索”，永文先生在另引用《武林旧事》后，加案语，谓邓注此处与原意差远，于是提出日本京都译注本释“泛索”为“临时需求”，较邓注所释，文

意更明。又同卷“内诸司”条“内弓剑枪甲军器等库”句,京都译注本释为弓剑、衣甲、枪、剑、弩五库,现案语中则引据龚延明《关于东京梦华录部分注文商榷》,指出应为内弓、剑、枪、甲四库,“军器”为总括词。龚延明先生为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,宋史专家,于宋代官制深有研究,这里就据以纠正京都译注本之误。

应当说,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,如敦煌遗书那样,已广泛引起海外学者的注意与兴趣。除日本学者外,永文先生在序中还提及美国学者奚如谷的《释梦——东京梦华录的来源、评价与影响》一篇专文,充分肯定其精湛功力与新的思维研究方向。当前,学术界已有提出,宋代城市文化研究,现在已可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。我想,这一学科建设,有关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著作,是应着重研究的。现在这一新的笺注本出版,必将促进中外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。我们可以乘此机缘,与海外学者友好合作,团结相处,互相交流,取长补短,这将会是世界汉学研究领域一项有意义的举措。

这一《笺注》本资料之繁富,可以说是同类著作所未有的。邓注本引有宋元典籍一百四十八种,而永文先生此书,则几乎包容了目下所能找到的所有宋代笔记小说,再加上元代及明清人的书,已达一千二百多种。所引用的,又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学、史学等典章制度之书,而是广泛引用诗文集、笔记、诗话、话本小说,甚至笑话、相声之类俗文学图书,可以说囊括多门类的知识,真是立足于“打通”,还原《东京梦华录》市俗生活的特色。不仅引书多,且注释面广。如邓之诚先生在其书序中曾谓原书“难施句读”,“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”,故其注在伎艺、饮食方面甚为薄弱,而永文先生在这两方面则集中力量。如卷二“酒楼”条,邓注本只注有二条,本书则有十三条;同卷“饮食果子”条,邓注本有二十一条,本书竟注有一百十九条,其中如“淹藏菜蔬”、“兜子”、“烧臄子”、“洗手蟹”等,都是别人未曾注意、也无由释义的。其他如“奇术异能”、“泥丸子”,以及“猴呈百戏,鱼跳刀门,使唤蜂蝶,追呼蝼蚁”,及有关《元宵》中

伎艺的注释,如把正文和注文串联起来,真可视为一部北宋伎艺短史。

本书注文范围极为广泛,其中注意以图配文,并多量采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宋代文物,如卷四“会仙酒楼”条,有谓“凡酒店中,不问何人,止两人对坐饮酒,亦有注碗一副”,笺注中除引用李济翁《资暇集》、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外,于案语中指出1963年安徽宿松县有宋墓出土由温碗、注子配套组成的注碗,并配有江西南城墓出土之注碗、酒台子等图,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。又如卷六“元宵”条,有三十六条注,记北宋各种伎艺,并选有陈元靓《事林广记》所载之蹴鞠图(共有六人踢球),在案语中又提及湖南博物馆所藏宋代蹴鞠铜镜,又有宋代敦煌壁画顶竿图、元至治《三国志平话》刻本“关公单刀会”之鼓笛图。

我想还有一处更使人感兴趣的,是卷三“相国寺内万姓交易”条,中称相国寺“殿后资圣门前,皆书籍、玩好、图画”,本书笺注就特将“书籍”一词列出,引有好几种宋人著作予以参证,如苏颂《苏魏公文集》、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、百岁寓翁《枫窗小牍》、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、王明清《玉照新志》、王得臣《麈史》、岳珂《桯史》、魏泰《东轩笔录》,具体记述相国寺内所售之书极为繁富,且多珍奇之作,后并加案语,提及辽宁省图书馆现藏有宋版《抱朴子》即为大相国寺东荣六郎书籍铺所刻(并配有图)。这对于我们现在研究书籍文化史,提供极有学术价值的史料。

其他如卷三“般载杂卖”条有“又有独轮车”句,即配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之独轮车图,使文中所记“前后二人把驾”、“前有驴拽”,更为形象;同卷“防火”条记有“火叉”,即配有《武经总要》之“火叉图”,都使人读后有清晰印象。其他所配图还不少,据统计,全书共配有宋代一百餘幅摹图,这应是笺注方式的创新之作,多有开拓餘地,很值得考虑。

书中引用大量经得起推敲的宋元话本小说及百回本《水浒传》,也富有特色。如宋话本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》,其中樊楼、曹

门、金明池、桑家瓦，都是东京实地；《万秀娘仇报山亭儿》中的山亭儿、茶坊、行院规矩，皆得东京习俗之真；《简贴和尚》中的鹌鹑饅飣儿吃法，可使人如睹东京饮食风貌，现于眼前。这些，都可以说是扩大了宋代文明史研究的领域。有些词句，引用话本小说加以参证，就可以使今天读者真切明白原意。如卷三“饮食果子”条有云“凡店内卖下酒厨子，谓之茶饭量酒博士”。此“茶饭量酒博士”如何理解？现注中引有宋话本《杨温拦路虎传》及《阴鹭积善》，就可以明白此茶博士为茶坊中服务人员的一种美称。又卷五“育子”条有“五男二女花样”，注中引宋话本《三现身包龙图断案》，后加案语，说明“五男二女”为宋时“家庭美满之喻”，如无此注，确不易明了原意。又，这里顺便提一下，即本书注文中一些重要条目，在引用若干材料后往往加有案语，标为“文案”。这些案语有长有短，涉及面广，在吸收诸家之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，引领读者把握问题的核心所在。全书约有五百余条案语，言简意深，多为本书著者自己读书深研所得，这也是笺注作法上一种新的探索。

最后我还想提一个建议。著者于《凡例》中说：“中华邓注本、京都译注本已注条目，本《笺注》不注，以免掠美之嫌，亦避免引起混乱。”即过去两本已注的，这部《笺注》本就不列，这在体例上是明确而谨严的。但对一般读者与多数研究、教学工作者来说，邓注本已出版多年，现在少见，京都译注本也不易见到，因此要想通读《东京梦华录》全书，会有一定难度。我过去曾细读过邓注本，邓注当然有所缺失，但它终究是中国关于《东京梦华录》的第一个注本，开创之功不可淹没，有些注引书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。因此，我想我们可以编撰一部较为完整的笺注本，既吸收邓注本、京都译注本值得引入的材料，又较广泛采纳国内外其他著作，在吸引时可以标明出处，同时还可作适当的补正，这就不会有掠美之嫌，反而有集大成之誉。我想伊永文先生或可予以斟酌，再过若干年，如对本书还有所正补时，不妨对此作一整体考虑。

（2004年冬初稿，2005年秋修订）

《全唐文补编》出版感言

● 陈尚君

本书从1986年开始编纂,1991年完成初稿,经过三次增订,到最近得与读者见面,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,确实太长了一些,但也不全是出版方面的原因。具体说来,全书篇幅比较大,排印和阅校都很费时间,而1996年出校时,我困于系务和《全唐五代诗》文稿,耽搁了一年多。这一耽搁,又正巧碰上了排版技术转型的最后阶段,已经排好校好的铅样因此报废,重新计算机排版又颇废周章。2002年排出第二次校样,又碰上我出国访学,再次耽搁了一两年。同时,在1993年退改和两次阅校过程中,我又不断检查群书,增补资料,大量校改和补遗,更在全书后面附录了近五十万字的《全唐文再补》和《全唐文又再补》,就是阅校时无法补入正编的新见文章。我觉得在广搜文献时,应该负责任地为学者提供尽可能丰备的文献,但因此给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麻烦,并造成了出版的延滞。我在本书《校后记》中写到:“本书从初稿交出,到正式出版,经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校订,虽然出版时间大为延后,但也因此得以利用了大量最新发表的珍稀文献,利用了大量当代杰出学者的研究成果,避免和纠正了因所见文本未能尽善、个人学识局限可能造成的错误。”这是实际情况,并非虚泛的表述。另外,漫长的等待也有意外的喜悦。本书因此而得以在今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前夕,与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另一部书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》同时出版,引起了媒体对于古文献研究此类冷学问的特殊关注,为校庆增添了一点花絮,也算对业师朱东润先生期待我为学校带来光

荣的愿望作了合适的回答。

我是在做完《全唐诗补编》后,即着手本书的编纂工作。唐诗的补遗常是翻了几十本书,所得不过几首或几句,常有大海捞针的感觉。在检寻唐诗过程中,发现唐人逸文的丰富遗存,因而有信心继续进行。最初的发现和积累确实令人兴奋愉快,每天常都有几万字遗文的发现。但随着工作的深入,越来越感到艰难,越来越感到难以胜任。唐文和唐诗比较起来,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围,大凡唐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,都在其中有所反映,即要求编纂者的学术素养必须涵盖中古学术的几乎所有方面,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学识范围。按照我的工作习惯,既然确定了选题,划定了体例,就应该在此范围内作竭泽而渔式的网罗收录。要做到这一点,又谈何容易。比方用书,我在1993年所作引用书目列出了1000多种书,实际翻检过的书,大约五到十倍于此。其后十多年,凡所到之处,无不广事搜罗。在境外访问期间,在日本早稻田大学、京都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图书馆都曾做过充分的查检,其中在早稻田大学几乎查遍了书库中的所有相关图书和刊物。这些所获都得以体现在本书中。正编中凡出校之书而在引用书目中未作反映者,都是以后补充的。涉及到如此众多的典籍,又希望尽可能利用较好的文本,尽可能追求遍征善本,虽然有此愿望,但要做到谈何容易。比方敦煌遗书,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只能依靠影印得不太清晰的《敦煌宝藏》钞录,虽然后来又用缩微胶卷作了部分的核对,错误仍复不少,虽然后来先后依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的英藏非佛教敦煌文献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法藏和俄藏敦煌文献作了补校,又参考了大量敦煌学者的研究成果,但漏校误录自知仍难以避免。再如佛教文献,上个世纪80年代只能看到《大正藏》,而且利用很不方便,所幸当时见到周振鹤教授从澳大利亚复印回来的部分资料,又从本校哲学系宗教研究室见到《续藏经》,才得以粗具轮廓。虽然努力将佛藏中的唐人遗文大致全部录出,但因为工作时手边始终没有全套藏经可以

翻检,必然还会有一些疏漏。近年在日本和香港见到十多种佛藏,尽可能地作了补充。至于石刻文献,本书尽可能地利用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就,利用了各类已经影印的拓本,并在此基础上为文本写定作了非常艰苦而自信尚属仔细的校订,但距离每一种石刻都能征求善拓、每一篇碑文逐字写定出校的要求,当然还相去甚远。

本书在录文限断和写定体例方面,基本沿用《全唐文》的旧例,所作只是局部的调整。就录文范围来说,当然应该严格限定《全唐文》系列所收以唐五代人的文章为限,不收专著,不收谈话,不收敕目,不收无文意的造像刻经题名,这些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。不收以契约户籍等为主的各类敦煌吐鲁番文书,则考虑到其自成系列,且为实际应用之记录,虽亦包含文章的成分,既然无法全录,不妨一般不收。再如书仪,是提供社会各阶层人士社会应酬中使用的范文文式,如果没有具体应用的内容,也以不收为妥。至于唐人文章全篇已逸而仅存残句者,我则依据有无原文文句保存作为收录与否的原则。虽然《全唐文》已经标举残篇断句收录无遗,收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,以致陈鸿墀只能在《全唐文纪事》中补出。最初考虑本书还有一个附录《唐文待访目》,记录已经失传的唐文情况,已经有二三十万字的积稿,得已逸文章篇名超过三千篇,固未能全部完成而放弃,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做完。

本书标点采用点断而不是新式标点,校勘则采用会校多本、写定一本、不出校记的方式,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同看法。2004年8月到南京大学参加古文献学术会议时,即有学者提出异议。我在《校后记》中于此已经作了申说。仅用句读,是与当时中华书局文学室主任许逸民先生商定的体例,一是考虑到与中华书局仅作点断的影印本《全唐文》配套,二是考虑到唐代遗文,特别是录自石刻和敦煌文献中的文章,残缺断损非常严重,用新式标点虽然较便阅读,但必然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错误。何况本书的读者主要是专业研究者,这方面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困难。至于会校而不出校记的体例,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。以昭陵碑刻来说,传世拓本很

多,从清中叶开始,每一种碑都有多种以至十多种录文,每一种录文都有其独到之处,但又必不可免地存在种种错误。在多数情况下,《全唐文》的录文都极其糟糕,但偶尔也有极珍贵而独见的存文,因为所据为内府拓本,仍不乏善拓,只是馆臣在校录时的工作态度和学术水平所限。前人录文以罗振玉《昭陵碑录》录文最精当,但出入仍多。近年的昭陵考古有不少新发现,善拓也屡有揭示,《昭陵碑石》颇多新意,但似乎不太会充分吸取前代工作的成绩,录文难以臻善。本书编纂之初,也曾考虑过逐一出校的体例,但试做之后发现,这样不仅工作量增加,篇幅上要扩充许多倍,实际意义则值得斟酌。比方昭陵某碑,《全唐文》的残缺和误录如何记录,其他各家的出入是否备载,各种拓本的存字多少如何表达,都似乎有加以记录的必要。将这些是非得失罗列出来,当然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,就如同近年中、日、韩学者对《好太王碑》的校录,用逐字排列十多家不同录文的差异。但一件或几件文献可以这样,面对几千篇遗文,就难以达到了。本书有鉴于此而有所变通,从而确保了以个人的力量可以达到完成,而全书的规模也让出版社和读者能够承受。虽然一般不出校记,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本书在文本的写定比读方面,作出了极其艰巨的努力,凡篇末注明出处的文献,都曾仔细作过逐字的推敲和取舍,凡所注两种以上出处的文章,文本已与任何一种文本都有所不同,可以说是新写定的文本,诸学者有所注意。如昭陵诸碑,本书的录文采据极其丰富,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录文最全备的文本。虽然没有逐字交待来源和差异,基本取舍都有充分的依凭,足为学者所信据。

从本书始纂到正式出版,经历了十九年时间,其间有关唐代文章的收集和整理取得了充分的成績。举其大端,一是《全唐文》有了两种新的标点本,笔者也做过《唐文拾遗》和《唐文续拾》的校补;二是唐代墓志和敦煌遗书研究的空前成绩,除了石刻墓志有了大量影印本,最值得称道的是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及其《续集》的出版;三是吴刚主编的《全唐文补遗》继1994年到2000年间出版七册后,

前不久又出版了第八册；四是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了号称补录唐文 13000 篇的《全唐文新编》。在这些书相继出版后，本书的价值又何在呢？这是近期不少朋友和学生常问我的问题，以下拟稍作一些说明。

当我开始着手编写本书不久，就听闻《唐代墓志汇编》的书稿已经交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为此我专门访问了该社历史室主任陈稼禾先生（已故），虽然没有见到书稿，但承他介绍了此书的基本情况，即仅录墓志一体，断限于唐末，主要利用《匋斋》、《千唐》、《曲石》、《芒洛》等石刻汇编和存世拓本，其他文献采据较少。为此曾考虑墓志一体完全不收，但在接触一部分文献后，就觉得这样非常可惜。在传世的四部书、佛藏和敦煌文献中，也有一些稀见的碑志，而地方文献中，保存尤为可观。在对存世文献和新见文献大规模全面地网罗过程中，同时搜集较容易，仅录墓志的学者未必同时做这样的工作。有虑于此，最初收录原则改为不取大宗的墓志汇编，仅录其他文献来源，特别是地方文献来源的墓志。1991 年交给出版社的第一稿中，收录墓志约六七百万方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1992 年出版，该书收唐墓志 3676 方，其中十分之九为《全唐文》所未收，字数超过 300 万字。显然，重复收录这部分墓志，对于出版社和读者来说，都是没有必要的额外负担。1993 年本书遵照中华书局编辑部意见修订时，即将初稿中与《唐代墓志汇编》重见篇目悉数删除。同时，又以该书与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所收墓志逐一对核，发现漏收 100 多篇，即予补出（后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大多也作了补录）。《全唐文补遗》出版稍晚，因而没有予以考虑规避。现在看来，此书几乎全部录自石刻，其中墓志约占十之九五，与本书并不重叠。其中重复部分，一是墓志以外的各体石刻，大约有一二百篇，二是五代墓志，也有数十篇重复。《全唐文补遗》大多录自石刻拓本，不注文献来源，本书则采据群书，于石刻部分也做过大量会校的工作，同一文的录文也多有不同，即使重复，也别具价值。本书所收墓志，大约有三五百万方，仅占全书十分之一

弱,一部分与前述诸书有重叠,但在前述诸书以外也有数量可观的保存,也具有一定意义。

至于《全唐文新编》所补诸文,虽称数量巨大,但所补的文章来源,一是把陆心源所补 3000 多篇都计入了自己的成绩;二是把《唐代墓志汇编》、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和《全唐文补遗》三书的内容全部采入,总数大约为 5500 到 6000 篇;三是从敦煌遗书、《永乐大典》和两《唐书》等书中,采录了大量所谓文章,其中包括了许多史书引录的君臣谈话、敦煌遗书中的籍帐文书、《永乐大典》中引录的存世或者不存世著作的片断引文等。除了利用已经发表的上述成果外,由于编者仓促成书,没有仔细调查典籍,搜寻文献,因而采辑了数量可观的一批似是而非的所谓逸文来顶冒。可以说,此书追求的目标不在学术方面,即便最表面的前人对唐代一些重要文集的补遗成果也没有吸取,更遑论其他了。

还必须说明的是,唐代墓志的编录大多以时间为序,与《全唐文》系列以作者为目编录唐人文章,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。有鉴于此,我在 1993 年编了《唐人墓志存目》,以存作者情况。但最近十多年唐代墓志的出土和发表数量实在太多,到 2004 年处理本书最后一校时,不可能再为后见诸书做这样的存目工作,请读者见谅,在此想顺便推荐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的《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》(2004 年 3 月汲古书院出版)。此书初版于 1997 年,编录了十种书的墓志目录,收墓志约 5482 方。新版采书增至 24 种,收录墓志达 6459 方,编次也极其精密。新版出版后的一年多里,又有《全唐文补遗》第八册、《邙洛碑志三百种》、《新中国出土墓志·河北卷》等书出版,加上《偃师杏园唐墓》、《榆林碑石》、《咸阳碑刻》等书所收,加上散见群书所见,估计还有 1000 多方。我在本书《校后记》中提出:“唐代石刻,主要是墓志,今后应有更完备的著作,即应包括拓本、录文、校勘、考订为一编的集大成的著作,也应该编出包括志主、作者、书者、出土时地及收录、研究内容的索引。”期待有人做这样的工作。